

## 中共中央控制紅軍的歷程： 以毛澤東的起落為中心

任偉\*

國共分裂後，中共開始創建軍隊，但在這一過程中，中共中央既沒有提供金錢支援，也缺乏人員支援，紅軍幾乎是獨自崛起。等到1930年前後，紅軍坐大，中共中央才把重心轉向根據地，重新審視軍隊的力量，並試圖加強控制。中共中央控制紅軍的過程，既有權力之爭，也涉及到組織制度、意識形態等因素。相較於北洋以來，武人難以管束的窘境，中共對軍事武裝的控制可謂相當得力。

關鍵字：毛澤東、紅軍、蘇區、周恩來、中共中央

---

\* 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講師，郵箱：renweirenjing@163.com。

## 一、前言

1927年之前，中共幾乎沒有軍隊；國共分裂後，借助暴動的機緣，紅軍才得以初步建立。起初，紅軍與中央的聯繫並不密切。如毛澤東、朱德在湘贛邊界，賀龍在湘鄂西，方志敏在贛東北，這些區域都極為偏僻，交通也非常閉塞。而當時的中共中央遠在上海，與這些地方的聯繫並不多。可以說，中共軍隊很大程度上是獨自成長起來的，與中央的聯繫十分薄弱。那麼，面對一支幾乎是獨立自主成長起來的部隊，中央能否指揮得動？又將如何指揮？我們知道，晚近以來，武人攜槍自持、割地稱王的事例十分普遍，甚至可以說，「革命軍興，革命黨亡」是近代社會的一個普遍特徵。但以後見之明觀之，中共顯然避免了落入此種窠臼。總體上看，中共中央對武人的整合相當成功。雖然前期不太注意，但等到紅軍做大做強以後，中央很快便將其控制住。放置於近代社會背景下觀看，這簡直是難以想像的。要知道，當時上海中央無錢、無槍、無人，卻能在1930年進入蘇區後迅速掌握大權，甚至在1932年的寧都會議上將紅軍的創建者毛澤東完全架空，此間的歷程曲折反復，值得細細梳理。

目前有關中共中央與紅軍關係的研究通常在兩個層面展開。其一，制度層面，主要探討黨軍關係，即通過梳理「黨指揮槍」這一制度的形成過程，反觀中共對軍隊的控制；<sup>1</sup>其二，權力鬥爭層面，這一研究取向主要聚焦在人事鬥爭上，尤其注重毛澤東與中央的爭論。<sup>2</sup>中共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論者大都以此理解中央與紅軍的關係。但事實上，毛澤東在三灣提出「黨指揮槍」這一準則時，<sup>3</sup>其實是要解決秋收起義部隊內部中黨權與軍權的關係，並不是界定軍隊與中央之間的關係。況且以毛澤東當時的身份(政

<sup>1</sup> 羅學渭、陳鋼，〈試析“黨指揮槍”建軍原則的確立過程〉，《井岡山大學學報》，第1期(吉安，2010.01)，頁10-13。

<sup>2</sup> 亞歷山大·潘佐夫著，卿文輝譯，《毛澤東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上冊，頁340-363；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頁1-73。

<sup>3</sup> 即「三灣改編」。1929年9月，毛澤東在三灣對秋收暴動部隊進行整頓。

治局候補委員)，也不可能由他提出統帥全域的革命原則。當然，中央後來的確是借助「黨指揮槍」這一條例，以「黨權」降服了「軍權」。但黨中央控制紅軍部隊是一個激烈而複雜的權力博弈過程，絕非泛泛一句「黨指揮槍」所能解釋。可以肯定的說，「黨權」強於「軍權」是一系列歷史演化的結果，而不是出於某個原則的先天規定。另一方面，中央控制紅軍的歷程中雖然有過權力鬥爭，但權力較量不僅關乎人事，亦關乎權力結構之調整。那麼，中共中央是通過什麼樣的權力結構設計掌握了軍隊？更為關鍵者，中共的權力鬥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展開？有沒有一個東西凌駕於權力鬥爭之上？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梳理澄清。

## 二、山高「中央」遠：黨能指揮槍嗎？

1927年前，中共領導人幾乎都沒有軍事經驗，毛澤東也不例外。國共合作時期他主要從事宣傳工作和工農運動，從未接觸過軍隊。毛後來自己也講：我是一個知識份子，當一個小學教員，也沒學過軍事，怎麼知道打仗呢？雖然在八七會議上他提出「槍桿子裏出政權」的口號，但那只是一種模糊的認識，並不是指全盤的軍事謀劃。就像他自己所說：「像我這樣一個人，從前並不會打仗，甚至連想也沒想到過要打仗」，只是因情勢所逼，才拿起武器，一步步走向戰場。<sup>4</sup>

秋收暴動是毛澤東轉向軍事的關鍵一步。隨後在井岡山的一年多時間裡，他在軍事上初露鋒芒。但緊接著又小遇挫折——1929年6月，因與朱德鬧意見，在紅軍七大上，毛澤東被迫退出軍隊。為解決朱毛糾紛；8月，陳毅去上海向中央報告相關問題；10月底陳毅攜中央指示信回到蘇區。中央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的集權主張，稱「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此即「九月來信」。<sup>5</sup>借助「九月來信」，毛澤東很快又在軍隊站穩腳

<sup>4</sup>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159。

<sup>5</sup> 〈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收入江西省檔案館、中央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中冊，頁146。

跟，並且在古田會議上進一步鞏固軍權。<sup>6</sup>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帶領紅軍逐步壯大的過程中，他與中央的聯繫十分鬆散。近代以來，武人專權的事例屢見不鮮，中共何以沒有落入此種窠臼？按常理來講，紅軍與中央隔著那麼遙遠的距離，況且，軍隊所需的糧草、彈藥等全靠自籌，與中央幾乎沒有任何關係。可以說，中央沒有任何能夠控制紅軍的物質手段，唯一可依靠的只有抽象的黨組織。但問題是，組織的力量真的有那麼強大嗎？1930年之後，隨著城市工人運動趨向衰落，中央開始把目光投向蘇區。此一時期，紅軍羽翼漸豐，軍事領導者毛澤東也躊躇滿志。遠在上海的中央，真的能夠收放自如的指揮調度蘇區軍隊嗎？檢視史實，可以發現在這段時期，上海的李立三與江西的毛澤東發生激烈爭執，而這實際上恰是中央與紅軍關係的一種寫照。

毛澤東違逆中央及上級黨組織的事例早已有之。例如秋收暴動，他就不顧中央指令，擅自轉向鄉村；再有1928年7月，湖南省委特派員杜修經要求朱毛軍隊開往湘南，毛澤東同樣是通過召開聯席擴大會議，將杜修經孤立起來，通過新的決議，堅決抵制湖南省委的命令，並要求省委重新討論，「予以新的決定」。<sup>7</sup>可以說，作為軍事將領的毛澤東充分踐行了「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從」的古訓。

古田會議之後，毛澤東的權勢進一步鞏固，而與此同時，李立三領導下的中央也再次趨向激進，要求紅軍「在戰略與戰術上必須向著交通要道中心城市發展」。毫無疑問，這一主張與毛澤東的革命思路完全相悖。通觀蘇區時代，毛澤東心中的第一要事就是保存紅軍的有生力量，不做無謂的犧牲，尤其不熱衷攻堅戰。其作戰風格是「避強打弱」，頗有點「深挖洞、廣積糧、緩稱王」的意思。對於毛澤東這些特質，中央看得也很清楚。1930年2月26日，中央向全黨發出通告，即稱「一切分散紅軍，逃避敵人進剿，向偏僻地區發展的觀念在現時局勢下，便成為極端錯誤的取消觀念」。這實際上就是在敲打毛澤東，因為在同一文件中，中央又明確批評「朱毛與鄂

<sup>6</sup> 古田會議，1929年12月召開，徹底解決毛澤東與朱德的紛爭，強調軍隊指揮權必須集中。

<sup>7</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上卷，頁246。

西的紅軍中還保存有過去躲避和分散的觀念」。<sup>8</sup>雖然李立三攜中央之名向毛澤東施壓，但毛並不理會。

毛澤東不配合中央的總體戰略，這讓上海的政治局委員們異常惱怒，他們不停的發電報進行催促、甚至是痛斥，但效果並不佳。如1930年4月2日，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上發表〈怎樣準備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的條件〉，矛頭直指毛澤東，批評稱「以鄉村來包圍城市」的想法是「一種幻想」，是「一種絕對錯誤的觀念」。5月，中央在上海召開全國紅軍代表會議，強調「紅軍革命的戰爭只有進攻，無所謂退守」，明確指出「過去在遊擊戰爭中獲得的所謂『敵進我退』，『敵退我打』的經驗一般不適用」。<sup>9</sup>這意味著，毛澤東的戰爭理念被全盤否決。6月9日，李立三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點名批評毛澤東，稱「紅軍狹隘的遊擊戰略，最明顯的是四軍毛澤東，他有他一貫的遊擊觀念，這一路線完全與中央的路線不同」，並指責毛澤東是妨礙「猛烈擴大紅軍」的代表人物。<sup>10</sup>6月15日，中央再次致信紅四軍前委，批評毛澤東的行為「現在完全反映著農民意識，在政治上表現出來機會主義的錯誤」，命令紅四軍堅決執行「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戰略計畫，並強硬表示「如果前委有誰不同意的，應即來中央解決」。<sup>11</sup>明顯可以看出，這封信充滿最後通牒的意味。中央急欲調動軍隊，但毛澤東卻不慌不忙。可見，僅憑信函指示，中央已經不能有效調度軍隊，黨權明顯難以支配軍權。

中央的批評與斥責，未能奏效。追其緣由，或許與地域空間上相隔較遠有關。因為山高皇帝遠，所以毛澤東有很大迴旋餘地。鑒於令文不奏效，中央只能從人事上著手，一種辦法是將毛澤東調離蘇區，弄到上海，這樣便可以大大削弱他對軍隊的掌控力；另一種辦法是派「欽差」前去督軍，

<sup>8</sup> 〈中央通告第七十號〉(1930年2月)，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檔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第6冊，頁28、33。

<sup>9</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上卷，頁178。

<sup>10</sup> 〈柏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關於目前政治任務決議案草案內容的報告〉(1930年6月9日)，《中共中央檔選集》第6冊，頁109。

<sup>11</sup> 〈中央致四軍前委信〉(1930年6月15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檔選集》第6冊，頁137。

迫使毛澤東按照指令行事。雙管齊下的核心目的，其實就是要徹底掌握軍隊，制止軍事將領抗命不遵的現象。

井岡山時期，中央就曾讓毛澤東去上海。1929年井岡山失守後，中央認為紅軍很難再形成一個大局面，建議將軍隊化作小股潛入鄉村，命令朱毛「應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sup>12</sup>毛澤東復信認為中央太悲觀，不同意遣散兵力，也不願意去上海。如果說此次中央意欲召回毛澤東，是因為情勢艱險，尚有保護的意思；那麼，古田會議之後，中央再次電召毛澤東，就很明顯帶有「馴服」的意圖。先是1930年4月3日，中央給紅四軍前委去信，令毛澤東去上海參加蘇維埃代表大會，並特地強調「務須執行中央這一個決定」。<sup>13</sup>中央原本是想借助全國蘇維埃大會的機會將毛澤東召到上海好生「訓導」，但毛澤東根本不動身。4月24日，中央再次催促，稱「對四軍特別指定毛澤東同志來出席」、「迄今今日，毛同志還未到滬，不知迭次調毛同志出來的信是否收到，或者毛同志業已動身，或是因事牽制不能出來，中央認為此次毛同志無論如何，必須出來一次」，即便蘇區代表大會過期，「毛同志亦必須出來一次」。<sup>14</sup>毫無疑問，中央急欲調毛澤東到上海當然是為了糾正其「錯誤」，毛澤東對此應該十分清楚。略為諷刺的是，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千方百計要調離毛澤東，但想不到幾個月後他與共產國際發生衝突，為將其「拿下」，蘇俄亦指示李立三去莫斯科「學習」。<sup>15</sup>可見，「調動」確是權力控制手段，只是中央最終未能調開毛澤東。

中央既指揮不動紅軍，又調不來毛澤東，剩下的唯一辦法只能是派人

<sup>12</sup> 〈中央給潤之、玉階兩同志並轉湘贛邊特委信〉（1929年2月7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檔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第5冊，頁37。

<sup>13</sup> 〈中央關於紅軍的當前任務給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30年4月3日），收入中共江西省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第1卷，頁757。

<sup>14</sup> 〈中央給四軍前委並轉三、四、五軍總前委的信〉（1930年4月24日），收入中共江西省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2卷，頁801。

<sup>15</sup> 〈致中共中央〉（1930年8月25日），收入中共江西省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2卷，頁1035。

前去。1930年6月，中央特派員塗振農到達蘇區，在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上(暨南陽會議)，塗振農重申中央指示，要求紅四軍進攻南昌。面對中央特派員的直接壓力，毛澤東只能表示「本路軍有配合江西工農群眾奪取九江、南昌以建設江西政權之任務，擬於七月五日以前全路軍開赴廣場集中」。<sup>16</sup>6月28日，朱毛紅軍離開閩西，開始向南昌遠征。雖然軍隊開始行動，但實際上，毛澤東對攻打南昌極不情願。7月底，紅一軍團開到南昌附近，但圍而不攻，只是在8月1日隔江向南昌城打槍示威，稱之為「八一示威」。很顯然，毛澤東是在消極應付中央的指示。對此，時任紅一軍團參謀處長的郭化若有很精彩的回憶，他稱當時的命令是「向南昌推進」，而「推進」二字大有文章可做。中央的命令是攻打南昌，不打，是抗命不遵；打，又枉受損失，故只能逐步推進到南昌附近再說，所以軍令上只提「推進」，不提「攻打」。<sup>17</sup>可見，中央特派員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迫使紅軍轉變戰略，但仍然難以完全降服毛澤東。

紅一軍團最終沒有強攻南昌，毛澤東後來解釋說：「若直進南昌，則敵人主力沒有消滅且在我軍後，南昌又四面環水，於勢不利」。<sup>18</sup>這確實是實際情況，但無奈不被中央理解。1930年8月7日，毛澤東得悉彭德懷率領紅三軍團攻佔長沙，旋即借機撤離南昌，決定向紅三軍團靠近。8月23日，毛澤東與彭德懷匯合。鑒於紅三軍團主張再次攻打長沙(紅三軍團7月27日曾佔領長沙，8月6日退出。)又加之中央催促，毛澤東雖然「預計長沙不易打下」，但也只得「同意先試一試」。<sup>19</sup>果不其然，紅軍圍攻長沙十多天，非但沒有破城，反而遭遇重大傷亡。9月12日，毛澤東率領紅四軍撤離長沙。但9月29日，中共中央長江局軍事部負責人周以粟到紅一方面軍司令部，傳達中央指示，要求再次攻打長沙。毛澤東當然不能接受，幸運的是，他最後竟成功說服周以粟放棄攻打長沙，因而這一次沒有與中央代表發生衝突。綜合起來看，塗振農和周以粟特作為中央特派員顯然都沒有完成任務。

<sup>16</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09。

<sup>17</sup> 郭化若，〈回憶第一次反“圍剿”期間的有關史實〉，收入陳毅、蕭華，《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頁150。

<sup>18</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11。

<sup>19</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12。

他們雖然給毛澤東帶去一定壓力，但最終還是未能有效糾正其「錯誤」。毛澤東仍舊自行其是，中央指令也仍舊得不到貫徹執行。

毛澤東之所以成功化解特派員的「逼迫」，一方面就事實層面看，「退守」的確勝過「進攻」。就當時情況而言，國共實力相差懸殊，這應該是毛澤東說服周以粟的關鍵；另一方面，特派員雖然挾中央之威，但畢竟勢單力薄，在軍中沒有根基。因而，毛澤東有足夠的空間與其周旋，甚至是虛與委蛇。例如，在攻打南昌一事上，毛澤東雖然在戰略上表示服從，但戰術上卻只進行佯攻與騷擾，並不用力去打，特派員涂振農對此毫無辦法。可以說，在李立三時代，不論中央採取何種策略，都不能完全控制紅軍。雖然蘇區軍事領導者多少會受到中央的一些束縛，但總體上看仍可「自由馳騁」。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自作主張，抗逆中央，並不是毫無壓力。一方面，中央不斷用理論的大棒對其進行敲打，並多次公開點名批評，而毛澤東幾乎沒有辯白的餘地。這是因為中央站在全域的高度，用理論和想像營造出一個革命高潮，並且使得很多同志真誠的相信這一點。共產國際當時就觀察到，在李立三的鼓動下，每一個同志「都滿懷著革命激情，十分真誠地相信，全國革命的時刻已經來到，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是叛徒」。<sup>20</sup>毛澤東雖然反對中央的軍事部署，但卻難以拆穿「革命高潮」的理論。這主要是因為紅軍局促在閩西一隅，對全國情況不瞭解。朱德後來就談到，雖然他和毛澤東不同意攻打中心城市，但他們沒有足夠的情報資料與理論資源來反對這項計畫。<sup>21</sup>無獨有偶，方志敏也有類似的困境，他稱「立三路線開始傳到贛東北時，我們曾經開會堅決反對過，認為是錯誤」，但後來中央決議來了，「大家才不敢說話」。方志敏反省到：「我們反對那種錯誤，但都不能從理論上圓滿地說明其錯誤的性質、由來與危險，不過多半是覺得實際上行不通罷了」。<sup>22</sup>這實際上與毛澤東的處境很類似——都只是「覺得

<sup>20</sup>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30年10月20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2卷，頁1153。

<sup>21</sup> 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頁326。

<sup>22</sup> 方志敏，《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68。

實際上行不通」，但卻沒有辦法從理論上駁斥。所以，對於中央的批評，毛澤東只能聽之任之，心中雖有不服，但卻難以辯白。

除去中央的批駁外，毛澤東還要頂住身邊人的壓力。當時軍隊和地方上有很多人擁護「進攻」戰略，軍隊中主要是以彭德懷為首的紅三軍團，地方上主要是以李文林為首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他們真誠相信革命高潮即將來臨，急欲攻打中心城市，這給毛澤東帶來很大壓力。例如，在討論是否攻打南昌、長沙時，就有人說毛澤東是「保守主義」、「逃跑主義」；又有人質問到：「你又不打長沙、又不打南昌，執行不執行中央路線？」<sup>23</sup>毛澤東與他們來回辯駁，展開激烈爭論，如 1930 年 9 月底的袁州會議、10 月 17 日的峽江會議、10 月 25 日的羅坊會議，幾乎都是圍繞著是否執行中央政策而展開。如果說對中央的指示，毛澤東可以置之不理的話，那對近在身邊的反對者，他就不能視而不見了。從持續不決的爭論中也可以推斷出，要說服彭德懷、李文林等人並不容易。幸運的是，1930 年底李立三被打倒，中央政策暫時發生扭轉，強調要先鞏固蘇區，不必忙於攻佔大城市。<sup>24</sup>至此，毛澤東終於長出一口氣，頗為自得的對先前擁護中央路線的人講：「你們這些人就是近在門口的不相信，離得很遠的卻很相信」。所謂「離得很遠的」無疑是指李立三時期的上海中央。<sup>25</sup>伴隨著李立三被打倒，毛澤東此前的抗命行為，反而成了功績，其軍事威望由此得到進一步提升。

毛澤東與中央的一系列爭論，或從一個側面表明中央已難以指揮紅軍。雖然毛澤東的主張更符合實際，但從組織原則上看，不聽指揮、抗逆中央的行動，又很難被寬恕。這裏其實牽涉到一個兩難的問題，即：若是中央政策錯誤，下級黨組織是該服從，還是該自行其是？1959 年彭德懷身陷囹圄後，對這一段歷史有過深刻反思，稱：「黨中央路線錯誤，下級黨在

<sup>23</sup> 滕代遠，〈袁州、羅坊會議前後的情況〉，收入陳毅、蕭華，《回憶中央蘇區》，頁139、140。

<sup>24</sup> 〈中共中央給紅軍的訓令〉(1930年12月10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2卷，頁1281。

<sup>25</sup> 譚震林，〈談中央紅軍反第一、二、三次大“圍剿”〉，收入陳毅、蕭華，《回憶中央蘇區》，頁162。

開始時不容易瞭解，因為它不容易瞭解全盤情況；即使瞭解了，也只能向中央建議，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避免嚴重損失，也只能抵制像打武昌那樣的事。如果開始就採取對抗，那就會有分裂黨的危險。」彭德懷最後坦承：「這個問題究竟應採取怎樣適當的辦法，到現在我還沒有肯定明確的觀念」。<sup>26</sup>應該說，這個問題在科層體制下帶有普遍性，只是在一個十分強調紀律與服從的體制裡更為突出。早在 1927 年，蔡和森就注意到：鐵的組織、鐵的紀律埋伏著很大的危險。在無限強調組織與紀律的情況下，黨員群眾很難有自己的意見，往往是依賴上級的指導，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種潛規則，即：只有上級機關的意見和是非，沒有下級黨部及群眾的意見和是非。下級黨部對於上級機關如果發生不同的意見或批評時，上級機關便認為是大逆不道，採取高壓。<sup>27</sup>通觀毛澤東與中央的爭論，其情形正如蔡和森所言。只是毛澤東性格強硬，能夠頂住上級的壓力。但到毛澤東自己掌權時，他也是特別強調中央權威，不容有異議。

### 三、中央權力向蘇區的滲透路徑

#### (一) 通訊網絡與權力控制

毛澤東在井岡山自由馳騁，不受中央調度，其中的一個關鍵因素，是通訊不暢。國共分裂後，全國一片白色恐怖，國民黨嚴密封鎖，中共轉入地下，層級間的通訊聯絡非常不便。整個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僅得中央來件二件二次」，一次是 1928 年 6 月的長信，10 月收到；一次是中共六大的決議案，1929 年 1 月在永新接到。<sup>28</sup>可見，在當時的通訊條件下，從上海傳遞給井岡山的信件，大概需要三四個月之久。這樣的時空距離，對軍

<sup>26</sup> 彭德懷，《彭德懷自傳》（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頁154。

<sup>27</sup> 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1927年9月），收入中國革命博物館編，《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06。

<sup>28</sup> 〈紅四軍前委關於攻克汀州及四、五軍江西紅二、四團行動方針等問題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報告〉（1929年3月20日），收入江西省檔案館、中央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頁69。

事指揮來講，顯然太過遙遠。這也決定了中央對朱毛紅軍不可能有具體的指示，只能談論一些方針政策問題。中央與紅軍的疏離，一方面是因為交通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國共分裂初期，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在城市，對偏遠鄉村的紅軍並未特別關注。

雖然中央給毛澤東去了兩封信，但毛澤東在 1928 年 8 月和 11 月給中央的回信，中央一個也沒有收到，所以中央對朱毛紅軍的情形非常隔膜。<sup>29</sup>直到 1929 年 2 月 6 日，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朱毛紅軍問題時，中央才計畫派人去找紅四軍。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隔得較為遙遠，但毛澤東似乎很渴望加強與中央的聯絡。1929 年 4 月，毛澤東給中央去信稱「以後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給我們，我們亦至少每月給中央一信報告」。<sup>30</sup>但恐怕令毛澤東沒有想到的是，後來中央真的開始與其頻繁通信，他遭到的卻都是掣肘與責難，遠不如通訊隔絕時期那般自由。

朱毛紅軍到贛南閩西後，與中央的通信逐漸頻繁，而且單程信函傳遞時間開始縮短。這主要是因 1929 年前後中央成立了交通局，並在汕頭、九江、漢口等交通要道設立了交通站，專門同贛南閩西根據地、鄂豫皖根據地和湘鄂西根據地進行聯絡。<sup>31</sup>井岡山時期，一封信由上海傳到毛澤東手中，大約需要 4 個月；贛南閩西時期需要 2 個月左右。如 1929 年 2 月 7 日中央給毛澤東去信，4 月 3 日，毛澤東即在瑞金收到；而毛澤東 4 月 5 日的復信，中央在 6 月初收到。古田會議之後，上海中央與紅軍之間的單程通信時間進一步縮短，只需 1 個月左右。如陳毅攜中央的「九月來信」（9 月 28 日）從上海出發，10 月底就達了蘇區；再例如，中央在 1930 年 8 月 29 日發出的《中央關於再度佔領長沙的戰略與策略給長江局並轉湘省委、湘鄂贛前委及行委的信》，毛澤東 9 月 29 日便收到。<sup>32</sup>就當時的陸路交通條件

<sup>29</sup> 〈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收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第1冊，頁200。

<sup>30</sup> 毛澤東，〈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收入毛澤東，《毛澤東軍事文集》(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第1卷，頁67。

<sup>31</sup> 江峰，〈試論紅軍的通信建設〉，《軍事歷史研究》，第3期(北京，2003.09)，頁65-74。

<sup>32</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15。

看，一個月應該是上海與蘇區之間的最快通訊時間，在無線電通訊建立之前，這一時限很難再被突破。

隨著中央與紅軍之間的通信方式趨於穩定，中央的指示也越來越頻繁。井岡山時期只有兩封信，且時間相隔好幾個月；古田會議之後，尤其是李立三時期，幾乎平均每個月中央都有來信。如 1930 年 4 月 3 日來信；4 月 24 日來信；6 月 15 日來信；8 月 29 日來信。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信函主要都是對毛澤東進行責難，催促其進攻中心城市。對此，毛澤東既難以反駁，但也不願遵照執行，唯一的辦法只有置之不理。查閱毛澤東在這幾個月的活動，全然不見他給中央回信，只有在 8 月 19 日曾致信中央，對不打南昌一事略作解釋。<sup>33</sup>雖然毛澤東對中央的指示置若罔聞，但無論如何，相較於井岡山時期，他在李立三時期感受到的壓力明顯更大。

資訊傳遞系統的完善，使得中央指令可以更迅速的傳達到紅軍中，中央權威也正是在這些指示和命令中得以體現和確立。但往返近兩個月的通訊時長，對於軍事作戰來講，還是太慢，前方軍事將領如毛澤東，仍可在戰略上表示服從，而在戰術上進行拖延。更甚者，鑒資訊傳遞緩慢，中央一時難以查實，毛澤東甚至有隱性欺騙之舉。例如，1930 年 10 月 14 日，毛澤東給中央寫信稱，紅一軍團於 10 月 18 日可抵達清江與紅五軍、紅八軍匯合，「即行佔領南潯路進攻南昌，在那一帶將有大規模的決戰」。毛澤東表態攻打南昌，當然是迫於中央此前的壓力。但實際上，他根本沒有進攻南昌的打算。三天之後，即 10 月 17 日，在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全體會議上，討論到關於紅軍行動問題時，他力言：不要繼續攻打大城市，而要東渡贛江到革命根據地內部關門打狗。在敵強我弱和湘敵強贛敵弱的情況下，要避實就虛，以弱勝強。<sup>34</sup>此番論調是毛澤東的一貫主張，但這與他三天前向中央鼓吹的「大規模決戰」完全不相符。毛澤東敢於對中央扯謊，一個重要原因或許就是因為通訊緩慢，中央一時半會難以查實軍隊行動。1932 年後，無線電通訊全面建立，訊息即時可到，毛澤東再想虛與委蛇就不那麼容易了。比如寧都會議前，他與後方中央局關於軍事行動問題再次

<sup>33</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11。

<sup>34</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17。

發生嚴重分歧，那時函電往來當天可達，他的不同意見被中央局迅速駁斥，軍事指揮權遭嚴格限制。從這個角度看，可以說，通訊與權力控制密切相關。

最初郵寄一封信要三四個月，而無線電通信即時可達，站在中央的角度看，這當然有利於控制紅軍。通訊便利以後，中央的指示就不僅關涉大政方針，而且細化到前線具體軍事部署，毛澤東等軍事將領因此受到較多掣肘，自由發揮空間嚴重受限。從權力控制的角度看，通訊條件之改善，無疑可以使中央權威更好、更快的體現；但諷刺的是，從作戰的角度看，中央對前線的指揮往往都不得法，基本上都是「亂彈琴」。

## (二)人員輸送：外來幹部與權勢轉移

紅軍初創時期，完全是自謀生路。中央在軍需和人員方面很少提供幫助。毛澤東帶領紅軍獨自壯大，人事佈局自然都是由其一手安排，中央完全沒有插手的餘地。這也是毛澤東無視中央指令，自由馳騁的關鍵原因之一。後來中央及湖南省委派員去調度朱毛紅軍——如周魯、杜修經、塗作農、周以粟等，他們雖然攜有上級指示，但因為與下級軍官毫無淵源，實際上很難有作為。毛澤東或是召開聯席會議，以人數優勢否決上級決議；或是暗令部隊拖延不前，特派員對此毫無辦法。其實，中央要控制軍隊，就必須要在下層有基礎；若軍隊自上而下結為一體，外部力量便很難指揮控制。李立三時期，中央就意識到需要加強對紅軍的領導，其中一個辦法便是派員充實紅軍幹部。中央權力開始向部隊基層滲透。

紅軍發展初期，幹部極為匱乏。1928年11月，毛澤東即向中央報告稱：「黨代表傷亡太多，除自辦訓練班訓練補充外，希望中央和兩省委派可充當黨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來」。<sup>35</sup>1929年3月，毛澤東再次給中央去信稱，「軍官及政治工作人員之缺乏，達於極點」，懇請中央調派幹部前來支援。<sup>36</sup>

<sup>35</sup> 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1928年11月25日），收入毛澤東，《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頁28。

<sup>36</sup> 毛澤東，〈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1929年3月20日），收入毛澤東，《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頁56。

其實，當時各地都很缺軍事幹部，下級黨組織都在向中央索要軍事人才。但 1930 年之前，中央並沒有大量派員去蘇區。一方面是因為中央仍視城市為革命中心，不願意把資源傾注到偏遠鄉村；另一方面，中央手中也沒有多少軍事幹部。畢竟，中共轉向武裝鬥爭的時間太短暫，來不及培養出大量軍事人才。1930 年 2 月，中央為此檢討稱，「過去派人之少，且不甚得力，自是實情」；但依數量計，「上海能去的人已搜羅殆盡」。<sup>37</sup>所謂「搜羅殆盡」，實際上也就數十人而已。

蘇俄最先從實際行動上援助與培養軍事幹部。1930 年 6 月，蘇俄決定對中共黨員加強軍事培訓，將在工農紅軍學校學習的中國人一律輸送回國，轉交中共中央安排工作；同時在莫斯科辦理軍事學習班，專門為中共培養軍事人才。<sup>38</sup>8 月 8 日，共產國際又指示中共設立短期軍事訓練班，專門培養中下級指揮員。<sup>39</sup>10 月，又令中共中央派員去蘇區建立「堅強的軍事政治領導」。一方面緣於共產國際的指導與催促；另一方面，鑒於李立三時代的經驗教訓，中央自身也意識到僅憑信函指示已難以控制紅軍，必須要派人去才有辦法。因而，1930 年 9 月，暨六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央派遣去蘇區的人員數量迅速增加。據不完全統計，從 1930 年 9 月到 1931 年 4 月，中央政治局向蘇區共派遣 228 名同志，其中到中央蘇區的有 67 人。<sup>40</sup>而在李立三時代之前，只有個別特派員去巡視。1931 年底，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前後，更多高級幹部被派到蘇區，這其中即包括周恩來、聶榮臻、葉劍英等人。不難想像，外來幹部蜂擁而至，必定會給既存權力體系帶來巨大

<sup>37</sup> 〈中央關於紅四軍問題致廣東省委信〉(1930年2月1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1卷，頁715。

<sup>38</sup> 〈關於招收中國工人進軍校學習的辦法〉(1930年6月15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2卷，頁857。

<sup>39</sup>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電報〉(1930年8月8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2卷，頁1011。

<sup>40</sup> 〈雷利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1年6月10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3卷，頁1641。

衝擊。

中央派遣來的幹部主要從事政治工作，一般充任政委角色。通觀紅軍部隊的人事變動，可以發現，1930年之後，政治幹部明顯經過一輪大換血。例如，紅一軍團政委羅榮桓被聶榮臻取代；紅三軍團政委滕代遠被楊尚昆取代；新組建的紅五軍團政委是從蘇俄回來蕭勁光。羅榮桓、滕代遠都是跟隨紅軍部隊成長起來，或可稱之為本土派；而聶榮臻、楊尚昆、蕭勁光等都是中央派遣來的幹部。除軍團一級外，在軍、師、團等也有很多政治委員被撤換。「大換血」實際上是一次權勢轉移，外來幹部與舊將領的淵源不深，中央自然更好控制；而且這些人學識較高，通常不把「山溝裏的馬克思主義」放在眼裏，與「本土派」非常疏離。蕭勁光即回憶稱，初入蘇區，看到士兵素質很差，軍事技能水準很低。面對這樣一支部隊，他自信心很足，便急切按照在蘇俄學習的軍事理論去進行改造，但結果卻是水土不服。蕭勁光後來反思稱，因為剛從蘇俄回來，不懂國情，去蘇俄學習的也是正規戰，對遊擊戰不瞭解，「也沒有虛心向堅持蘇區鬥爭的老同志請教」。<sup>41</sup>平心而論，那個時期，從上海或莫斯科來的人，應該沒有幾個會虛心向「老同志請教」。實際上，中央也並不希望他們向「老同志」請教。中央派他們到蘇區，主要目的是去糾正「老同志」的錯誤。

需要說明的是，中央撤換舊幹部，扶植新幹部，都是在「引進工人幹部」和「改造舊幹部」的名義下進行的。那個時期，中央一邊強調提高工人幹部的比例；一邊洗刷舊幹部，號召與「留戀舊幹部和形式主義做無情的鬥爭」，<sup>42</sup>要求「吸引新的對國際路線堅決執行的工農分子來代替這些落後的幹部」。<sup>43</sup>強調工人成分是中共六大以來的黨內傳統。中央正是借助這一傳統，完成了幹部的新老更替。表面上看，此舉是為了加強幹部隊伍，

<sup>41</sup> 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頁37、38。

<sup>42</sup> 〈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1931年11月1日至5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3卷，頁1845。

<sup>43</sup> 〈蘇區中央局給江西省委指示信〉（1932年1月19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3卷，頁2009。

但實際上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新幹部」比「老幹部」更革命、更有能力。人員輪換的實質其實是權力更替。對此，那些被替換下來的「老幹部」有著非常深刻的體會。在他們看來，外來新幹部就是來搶班奪權的。黃克誠後來即不無憤懣的談到，中央當時的幹部政策很有問題，片面強調紅軍骨幹應是工人出身的「無產階級分子」，並且利用這個名目，把原來贊成和擁護毛澤東主張的幹部調開，塞進一些外來人員，進行「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的活動，但實際效果並不佳。<sup>44</sup>彭德懷也對「不要老政治委員，而要換新政委」的舉措相當不滿。<sup>45</sup>至於毛澤東，他肯定能意識潛在的權力危機，只是沒有辦法拒絕這些外來者。到延安後，舊事重提，他直言「欽差大臣滿天飛」，實際上就是批評外來幹部搶班奪權。

中央派遣來的幹部陸續進入軍隊，主要擔負政治工作。與此同時，政治委員的權力也大幅上升。紅軍最早實行黨委制，軍隊各級黨委執行委員均在十幾人左右，有時會擴大到二十多人，部隊事務由黨委集體討論決定。<sup>46</sup>1930年7月，共產國際要求紅軍部隊廢除黨委制，實行政委領導制。指示稱：政治委員制度在軍隊中與黨組織是平行存在的，並且高於這些組織之上。連、營、團、師、軍政治委員對於黨支部和他下屬的政治委員都具有上級黨組織的一切權力。共產國際特別強調到，中國紅軍可以有一些改變，但有一點是不能改變的，即「明確的、有組織的形成以政治委員制度為領導的黨的組織體系」。<sup>47</sup>制度改變必定會牽涉到權力分配。黨委制有兩個特點：其一，會議基本上是由軍事將領主導；其二，民主氛圍濃厚。在此局面下，新幹部即便有心奪權，但因為人數不佔優勢，民主表決時往往處於少數，因而難以主導整個紅軍部隊。可是政委制就不同，它規定政治委員的權力高於軍事將領，甚至是凌駕於黨組織之上，這就徹底顛覆了原有的權力架

<sup>44</sup> 黃克誠，《黃克誠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頁189。

<sup>45</sup> 彭德懷，《彭德懷自傳》（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頁186。

<sup>46</sup> 陳毅，〈關於朱毛紅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1929年9月1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第6冊，頁470。

<sup>47</sup>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就紅軍建設和遊擊運動問題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信〉（1930年7月29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2卷，頁967。

構。政委擁有最高權力，可以直接主導軍隊；而舊幹部雖然人數多，但在制度上卻都處於受支配地位。可以說，政委制之實行，一方面使得軍隊權力集中傾斜到新幹部手中；另一方面，前委及其下屬的舊幹部，在權力結構上開始被邊緣化。

當然，新制度的推行並不那麼容易，原先的舊幹部對政委制非常抵制。直到 1931 年 9 月，歐陽欽向中央報告朱毛紅軍中的情況時還稱：政治委員制度仍未能建立，一切主要問題仍是黨來解決，在黨的委員會決定之後來執行。<sup>48</sup>政委制度遲遲不能推行，中央自然非常不滿。1931 年 11 月，在第一次蘇區代表大會上，中央一邊痛批毛澤東；一邊痛斥黨委制，認為各級黨的委員會削弱了政治委員和政治部代表的權威，嚴令取消「紅軍中超過政治委員政治部的職權的各級黨的委員會」，規定「黨的一切組織都應該在政治部管理之下」。<sup>49</sup>毛澤東等軍事將領雖有不服，卻也無可奈何，政委制在中央的主導下最終全面推行。到 1933 年 1 月，蘇區中央局宣佈稱：紅軍中政治委員制的建立，都獲得了相當的成績。<sup>50</sup>

回過頭看，在中央沒幹部，也無心派幹部的時候，毛澤東等人屢次請求派員；然而，當 1930 年後中央真的開始大量派員進駐蘇區時，毛澤東等人才發現「援助」的代價其實很沉重。中央權威借助外來幹部深入到紅軍軀幹中，對紅軍的控制力大大強化。郭化若後來不無感慨的稱，因外來幹部步步深入，「原來在毛澤東同志身邊工作的同志也逐步被攆走了」。如此一來，毛主席便被架空了。<sup>51</sup>1932 年之後，毛澤東與中央再次發生分歧，那時他就很難再率紅軍自由馳騁了，因為從上到下都有中央「欽差」與其抗衡。

<sup>48</sup> 〈中央蘇維埃區域報告〉(1931年9月3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3卷，頁1758。

<sup>49</sup> 〈紅軍問題決議案〉(1931年11月1日至5日間)，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3卷，頁1855。

<sup>50</sup> 〈中共蘇區中央局關於鞏固黨的組織與領導的決議〉(1933年1月10日)，收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2冊，頁311。

<sup>51</sup> 郭化若，《郭化若回憶錄》(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頁87。

### (三) 重組權力結構：蘇區中央局的創建及其影響

中央通過加強通訊和派遣人員等手段，逐步強化對蘇區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在權力的組織架構上，毛澤東等本土將領仍居於最上端。自朱毛會師後，紅軍的最高權力機構一直是前敵委員會，而毛澤東則長時間擔任前委書記一職，只有在 1929 年 6 月朱毛之爭時，短暫離開過三個月。1930 年 2 月，朱毛率領的紅四軍與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匯合。兩軍聯合地方黨部召開聯席會議，組建共同前敵委員會，前委由 17 人組成，毛澤東、朱德、曾山、劉士奇、潘心源為常委，彭德懷、黃公略為候補常委，毛澤東任書記，這人基本上都是在蘇區起家的。<sup>52</sup>共同前敵委員會領導紅四軍、紅五軍、紅六軍和贛南、閩西、粵東等地方黨，全面統管黨政軍事務，是蘇區的最高權力機構。1930 年 8 月，共同前敵委員會改為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仍由毛澤東等本土將領主導。

1930 年起，中央陸續向蘇區派遣政工人員，但那些人只佔據中高級職位，並未觸及到最高權力。但是，中央若想完全控制蘇區，就一定會觸碰到最高權力體系。一般來講，中央要控制蘇區，最簡便的方式就是將毛澤東直接調開，任命外來者擔任前委書記。但問題是，毛澤東在蘇區經營多年，根基深厚，若無緣無故的將其撤換，震動太大，必定會影響團結，甚或會引發分裂。李立三時代，中央曾幾次調令毛澤東去上海彙報工作，毛都置之不理，更何況是直接削權，毛澤東必定更加不從。而且從革命總的原則上看，雖然中央與毛澤東有分歧，但在取得革命勝利這一問題上，二者還是存在共識。中央對毛澤東的態度一直是希望其改正錯誤，再予以重用，而不是將其一棒子打死。畢竟，毛澤東的軍事才能，是經過實踐檢驗的。既然不便直接從人事上入手，那麼另外一個辦法就是旁敲側擊——設置新的權力機構。如此一來，中央既可不直接觸碰毛澤東，又能方便的將「新人」塞進最高權力體系中。

最先建議重置權力機構的是共產國際。1930 年 7 月，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發來電報，要求「採取一切措施最大限度地加強紅軍」、「最大限度地

<sup>52</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頁 296。

集中和保證黨對紅軍的領導」。為達到這個目的，共產國際指示必須要在蘇區成立有權威的中央局。<sup>53</sup>這實際上就意味著，新機構的權力將凌駕於舊機構之上。接莫斯科來電後，1930年8月26日，周恩來首先在政治局上提出成立蘇區中央局的問題；9月28日，六屆三中全會正式表決通過；10月17日，蘇區中央局宣告成立。1931年3月18日，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在黃陂召開。蘇區中央局在籌畫階段，上海中央對人事問題就特別注意。原本計畫由項英、關向應、毛澤東和幾位蘇俄同志組成中央局委員。但關向應在去往蘇區的路途中，因國民黨嚴密封鎖，無法通過，只得返回；中央後來才又派項英前去。<sup>54</sup>起初，項英一個人難以擔負起全面工作，急需加派人手。然而中央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同志，在此情況下，周恩來提出去蘇區，但共產國際不同意，認為周恩來是中央政治局裏「不可替代的人物」，要其留在上海主持大局。<sup>55</sup>後來幾經商議，才派出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等前往蘇區幫助項英。

蘇區中央局正式成立後，中央指定任命的委員共有七人，分別是項英、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鄧發，其中項英代理中央局書記。如此一來，毛澤東在這一新的權力體系中，只是其中的一員，不能完全主導局面。而且原蘇區核心幹部如彭德懷、陳毅、曾山等都被排除出了新的權力體系。為了鞏固地位，不被孤立，毛澤東在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上就提出增添彭德懷、林彪、周以粟、曾山、陳毅等5人為中央局委員，以後又在7月8日和10月11日，兩次向中央要求增加中央局成員人數。毛澤東提出的這幾個人全都是原來的蘇區幹部。很明顯，他是想讓「新瓶

<sup>53</sup>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早於1930年7月10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2卷，頁903。

<sup>54</sup> 〈中央關於對付敵人“圍剿”的策略問題給一、三兩集團軍前委諸同志的指示〉（1930年10月29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2卷，頁1208。

<sup>55</sup>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30年10月20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2卷，頁1157。

裝舊酒」。但 10 月下旬，中央明確表示：「地方幹部對中央局的成分無任意變更之權。中央局成分無擴大之必要」。<sup>56</sup>中央拒絕毛澤東的提議，在當時引起很大震動。後來蕭克、郭化若等人在回憶錄中都曾提及這一事件。<sup>57</sup>

當然，中央局取代總前委成為蘇區最高權力機構也有一個過程。起初，中央局與總前委有分工，總前委領導作戰工作，中央局「專負地方工作」。<sup>58</sup>從制度上講，毛澤東仍然是蘇區軍事最高領導人。但 1931 年 1 月，中央宣佈撤銷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將全部權力集中於蘇區中央局。1931 年 5 月，中央頒發《關於蘇維埃區域黨的組織決議案》，明確規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去直接指導和幫助地方黨部工作；有權改正和停止當地最高黨部的決議與解散地方黨委；中央局成員不由地方選舉，「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蘇區工作必須在中央局的指導下進行系統改造。<sup>59</sup>10 月下旬，中共中央再次重申：「中央局是中央在蘇區的代表團，代表中央領導蘇區一切工作」、「地方幹部對於中央局的成分無任意變更之權，如對中局或中局某同志有任何意見，應報告中央由中央解決」。<sup>60</sup>這就完全確立了中央局的權威地位。

中央局成立起始，外來幹部只有項英一人，任弼時、王稼祥等尚未到達蘇區。由於人員不足，各部都是空架子，所以毛澤東仍大權在握。但 1931 年 4 月，任弼時、王稼祥等人相繼到達蘇區，形勢便逐漸發生變化。據郭化若回憶，蘇區中央局形式上是項英同志掌權，但實際上權力掌握在任弼時手裏，王稼祥出主意，顧作霖打先鋒。<sup>61</sup>檢視史實，不難發現，自任弼時

<sup>56</sup> 《中央致蘇區中央局電》(1931年10月30日以前)，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3卷，頁1813。

<sup>57</sup> 肖克，〈關於中央蘇區的幾個問題〉；郭化若，〈回憶第一次反“圍剿”期間的有關史實〉，收入陳毅、蕭華，《回憶中央蘇區》，頁156；215。

<sup>58</sup> 〈蘇區中央局報告〉(1931年7月8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3卷，頁1680。

<sup>59</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頁168。

<sup>60</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年譜》，頁175。

<sup>61</sup> 郭化若，〈回憶第一次反“圍剿”期間的有關史實〉，收入陳毅、蕭華，《回憶中央蘇區》，頁154。

到蘇區後，毛澤東即遭遇多重批判，越來越難以自由馳騁。首先是關於戰略問題，毛澤東主張「誘敵深入」，但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局主張「分兵退敵」，並批評毛澤東是「遊擊主義」。其次，在土地政策和階級劃分等問題上，毛澤東的主張又被指責為「右傾」。<sup>62</sup>最後，在諸多爭論中，影響最大的是關於「經驗」與「理論」問題的爭論。這一問題實際上是由毛澤東主動挑起。毛澤東向來重視實踐問題，早在井岡山時期，就做過《永新調查》。豐富的實踐經驗成為毛澤東對抗中央「欽差」的一大利器。1930年5月，在尋鄔做調查時，他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需要注意的是，此一時期，毛澤東已經開始遭受中央指責。作為回應，他以自身的實踐為立足點，明確反對「本本主義」。稱「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必須要把上級所作的決定、指示同本地區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sup>63</sup>很明顯，這段話的含義實際上就是拒絕「惟中央之命是從」。面對中央咄咄逼人的氣勢，毛澤東很難從組織上正面對抗，只有迂迴的以「經驗」、「實踐」問題為突破口，而這正是外來幹部的短板。10月下旬，毛澤東又在興國做調查，1931年1月整理成文。在《興國調查》中，毛澤東大膽提出：「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裏面想像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過去紅色區域弄出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緣故」。<sup>64</sup>這些言語明顯是針對「欽差大臣」而發。4月，毛澤東更為尖銳的指出：「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只憑自己空想去決定工作計畫，去指導下級工作，結果計畫是行不通的，指導是錯了的」。<sup>65</sup>不難發現，1931年前後，毛澤東屢屢提及「經驗」的作用，並將其與「發言權」聯繫起來。這其中的一個重要背景，便是中央「欽差」日漸活躍，開始越來越多的在蘇區「指手畫腳」。毛澤東顯然是想借「經驗」問題將他們壓制住。

<sup>62</sup>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檔選集》第7冊，頁258、262。

<sup>63</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06。

<sup>64</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21。

<sup>65</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36。

但問題是，以任弼時為首的外來幹部，並沒有被毛澤東嚇唬住。他們借助中央局及其下屬的黨刊黨報，針鋒相對的批評「狹隘的經驗論」，矛頭直指毛澤東。1931年11月，贛南會議召開，「經驗」與「理論」的鬥爭達到最高潮。針對毛澤東提出的「反對本本主義」和「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等論斷。任弼時在起草的《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中，反擊稱「黨內流行一種狹隘的經驗論調，實際上是反理論的傾向」。<sup>66</sup>在《紅軍問題決議案》中，他更加激烈的批評到：「紅軍中狹義的經驗論，在實際工作中生了不小影響，根本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單憑自己的狹小經驗和短小眼光來分析各種問題，這完全是農民的落後思想」。<sup>67</sup>面對猛烈的反擊與斥責，毛澤東毫無辦法。畢竟，外來幹部在中央局裏佔有絕對優勢。況且，蘇區的報刊也被王稼祥等人掌握，談「理論」正是他們的強項。毛澤東既沒有發聲的途徑，也不具備全面反擊的能力。此一時期，蘇區大興「理論」之風，甚至連朱德也撰文稱，紅軍「因為環境關係，一般缺乏理論研究」。<sup>68</sup>可以說，自任弼時、王稼祥到蘇區後，中央局各部門日漸充實，毛澤東便開始漸漸陷入孤家寡人的狀態了。反過來看，毛澤東本想借「經驗」問題來壓制外來幹部，結果卻被打成「狹隘的經驗論」者。這恐怕是他起初沒有想到的。

中央局作為蘇區最高權力機構，被任弼時、王稼祥等外來幹部掌控。毛澤東的權威日漸被削弱，此前的爭論已經是明顯的表徵，而1932年1月的葉坪會議，就更能直接說明問題。1932年1月中旬，毛澤東在瑞金葉坪主持召開中央局會議。他談到，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華，勢必引起全國抗日高潮，國內階級關係必將發生變化。但中央代表團成員卻指責說：「日本佔領東北主要是為了進攻蘇聯，不作此估計就是右傾機會主義」、「我們必須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否則「就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因為批評者人

<sup>66</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年譜》，頁176。

<sup>67</sup> 〈紅軍問題決議案〉(1931年11月1日至5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3卷，頁1853。

<sup>68</sup> 朱德，〈談幾個戰術的基本原則〉(1933年6月)，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朱德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14。

多勢眾，毛澤東被迫沉默，「一言不發」。中央局則在會議途中就更換主持人。毛澤東雖然憤懣，但毫無辦法，只有在會後請病假，前往瑞金郊區東華山古廟假休養。<sup>69</sup>可以看出，在蘇區核心權力層中，毛澤東已被完全孤立。

需要稍加說明的是，毛澤東請病假休養，暫時離開中央局，實際上帶有「以退為進」的意思。1929年紅軍七大時，朱毛相爭，毛澤東也是稱病隱去，等待中央裁決。然而，此次毛澤東拂袖而去，中央並沒有積極挽留。直到兩個月後，紅軍攻打贛州遇挫，項英才去請毛澤東「出山」。但回到前線後，毛澤東的軍事主張並未被採納。因為，他向偏遠地區發展的主張，完全不符合中央的「進攻」精神。在李立三時期，毛澤東尚能硬頂著中央的壓力，獨斷專行。但後來，因為有中央局的強力制衡，毛澤東已不可能自行其是了。可以說，自中央局這一權力機構成熟完善之後，毛澤東的手腳便被牢牢束縛住。1971年，毛澤東在〈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紀要〉中就說：「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這四年我在中央毫無發言權」。<sup>70</sup>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並未將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看作轉捩點，而是從1931年算起。很明顯，這個時間點正是中央局成立和外來幹部大批到來的時期。

總前委時期，毛澤東一言九鼎，完全駕馭著蘇區最高權力機構。但中央局成立後，權勢便開始發生轉移。毛澤東雖然進入了新的核心權力層，但畢竟屬於少數，不能像以往那樣主導局面。中央局取代總前委，實質性的意義是人事變動，在新的權力機構中，中央派遣的外來幹部佔據核心地位，而毛澤東及大批原蘇區幹部則紛紛被邊緣化。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等人並非沒有反擊，但中共中央依靠權力結構之調整和基層幹部對組織的信仰，有效而平穩的滲透進軍隊，最終全面掌握蘇區的軍政大權。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中共基層幹部對中央、對組織的信仰絕非一日之功。國共合作時期，中共就特別專注於組織建設，陳獨秀等人屢次強調「在理論上，應該先有了強大的革命黨，然後才能有革命軍隊；有了革命軍隊，

<sup>69</sup>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頁321。

<sup>70</sup> 郭德宏編，《王明年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頁710。

然後才能有革命政府」。<sup>71</sup>以後見之明觀之，中共「先黨後軍」的發展路線雖然一時受挫，但卻具有強大的韌性。1927年後，中共革命轉向武裝鬥爭，前期的組織建設、信仰養成不但沒有荒廢，反而為後來的軍事發展提供了強大助力。中共中央能夠有效控制紅軍，與這樣一個潛在的制度基礎，有莫大關係。

#### 四、道相通，謀相異，權相爭——寧都會議的前前後後

自中央局進駐蘇區後，毛澤東就不斷受到壓制，直到寧都會議上被完全架空。高華將毛澤東的失勢完全視為權力鬥爭失敗的結果。但實際上，毛澤東與中央局的紛爭，並不完全是權謀的算計與較量。這場衝突至少涉及三個層面的問題，即：道、謀、權。在終極層面上，毛澤東與中央都希望革命勝利，可謂是「道相通」。但在如何取得勝利這一問題上，毛澤東的看法與中央歷來不同。從井岡山時期起，上海中央就指責毛澤東「右傾」、「保守」，後來蘇區中央局與毛澤東爭論的其實還是這個問題。這或可視作「謀相異」。謀略不同，導致爭論不斷。那麼，最後就必定會涉及到權力角逐。事實上，毛澤東與中央局也正是因為謀略上的分歧，才一步步發展到權力相爭。畢竟，謀略與權力很難分得開。通常來講，只有謀略在實踐中運用成功，才會獲得並鞏固權力。1927年後，毛澤東在蘇區的崛起，正是遵循著這條道路。但反過來看，很多時候，謀略的實施也都要以權力為依託，尤其是當革命者之間出現分歧時，「正確」的謀略總是與最高權力聯繫在一起，而失去權勢者的論說，大都被視為「路線錯誤」。

需要說明的是，從謀略分歧，到權力相爭，是有一個變化過程的，中央並非一開始就要處心積慮的弄垮毛澤東。因為「道相通」，所以中央起初對毛澤東極力「優容」，但毛澤東卻不知「悔改」。可以說，在如何革命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與上海中央一直不能達成一致。中央屢次批評蘇區政策「保守」，可是毛澤東視若無睹，仍堅持己見。1931年中央局進駐蘇區的一

<sup>71</sup> 陳獨秀，〈國民黨的一個根本問題〉（1924年10月1日），收入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3卷，頁372。

個重要任務就是要糾正過去的「錯誤」、「以便保證國際和中央路線百分之百的執行」。<sup>72</sup>不難推想，中央局的「糾錯」舉動，必定要涉及到人事紛爭。從這個角度看，寧都會議上，中央局剝奪的其實不只是毛澤東的權力，更為關鍵的是斬斷了另一種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從全域看，後者的意義與影響恐怕更為重要。

毛澤東與中央局的「搏鬥」曲折隱秘。因相關檔案材料開放不夠，所以諸多細節仍然撲朔迷離。本文雖盡力搜羅，但也只能呈現一個大致輪廓。總體上看，贛南會議(1931年11月)之後，毛澤東的權威便遭到極大削弱。當時以中央局成員為首的外來幹部已經從上到下佔據著要害部門。1931年11月15日，王稼祥等人致電上海臨時中央時即稱：「中央局同志多已分任軍政工作」，正努力糾正過去的錯誤。<sup>73</sup>1932年1月，葉坪會議上毛澤東憤而離隊「休養」，實際上已經有點孤家寡人的味道了。即便如此，毛澤東仍然不能苟同中央的「進攻」政策。當周恩來到蘇區後，毛澤東再次提出在偏僻區域(主要是贛東北和閩西)擴大蘇區的計畫，反對攻佔中心城市。然而，周恩來並沒有積極回應。「毛澤東遭到反對後，暫時放棄了自己的計畫」。<sup>74</sup>

毛澤東戰略計畫不被認同，其實與整個大環境有關。1932年前後，從共產國際到中共中央都充滿樂觀的情緒。如1931年11月20日，米夫給史達林的信中就談到，「現在形勢有所不同」、「應該從防禦轉入進攻」。<sup>75</sup>稍後，中共中央發佈「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極力宣導向中心城市進攻。這標誌著革命戰略全面轉向激進。與此同時，蘇區報刊也都在鋪天蓋地的宣揚「向外發展」。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之所以極為樂觀，有兩個重要原因。其一，國民黨各軍閥派系混戰正如火如荼，使得中共以為有機可乘；其二，「九一八」事變爆發，國民黨承受巨大壓力，中共產生

<sup>72</sup>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檔選集》第7冊，頁221-227。

<sup>73</sup> 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63。

<sup>74</sup> 〈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和朱德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2年5月3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3卷，頁2164。

<sup>75</sup> 〈米夫給史達林的信〉(1931年11月20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3卷，頁1903。

趁火打劫的心態。應該說，除毛澤東外，當時中央局成員都主張攻打中心城市。此種局面之下，毛澤東仍能堅持其一貫的「右」傾主張，這其實相當不容易，沒有足夠的膽魄，很難有此堅持。瞿秋白曾講：「我黨有獨立意見的要算澤東」。<sup>76</sup>應該說，這是一個精準的觀察。毛澤東的「不識時務」，或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他並非惟權勢是瞻。

中央局主導的「進攻」戰略確定後，1932年1月，紅軍開始攻打中心城市——贛州。毛澤東自然表示反對。但中央局對攻打贛州很有信心。彭德懷、朱德等軍事將領也都持樂觀態度。<sup>77</sup>彭德懷擔任前敵總指揮，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親赴前線督戰。當時就有人講：等打開贛州再和毛澤東算賬。<sup>78</sup>不難想像，若是紅軍順利打下贛州，毛澤東一定會「休養」更長時間。幸運，又或者說不幸的是，紅軍苦攻贛州兩個月，非但不克，反而自身傷亡慘重。這一方面是因為贛州城牆堅固，且三面環水，易守難攻，素有「鐵贛州」之稱；另一方面是因為敵情判斷錯誤，紅軍當時估計守城兵力是8000人，但實際上有1.8萬人，而負責圍攻的紅三軍團才1.4萬人。紅軍久攻不下，中央局才委派項英去請毛澤東奔赴前線參加決策。

毛澤東歸來後，秉性不改，仍舊兜售他一貫的保守戰略。1932年3月中旬，在江口召會議上，他尖銳的批評攻打贛州是「李立三路線的繼續」，再次主張往贛東北、閩西等偏遠地區發展。<sup>79</sup>紅軍雖然被迫撤離贛州，但中央局既不認為攻打贛州是戰略失誤，也不接受向偏遠區域轉移的建議。3月23日，王稼祥發表〈圍攻贛州的教訓〉一文，非常明白的重申了「進攻」的正確性。他首先就指出：攻打贛州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確的。至於遭遇失敗，一方面是因為後方醫藥、糧食、彈藥等問題沒有解決；另一方面是因為紅軍中游擊主義傳統濃厚，導致各自為政，下級不嚴格執行上級命令。很明顯，中央局把失敗的原因歸結為紅軍自身的問題，而不是國民黨的強

<sup>76</sup>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頁151。

<sup>77</sup> 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180。

<sup>78</sup>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頁320。

<sup>79</sup> 〈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和朱德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2年5月3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3卷，頁2164。

大。這與毛澤東的看法迥然相異。王稼祥最後談到，假若因為贛州撤圍，而認為提出爭取中心城市的口號為時過早，應向著偏僻的地方發展，不應向著中心城市發展，不奪取中心城市，「這一切觀念都是錯誤的，右傾機會主義的」。<sup>80</sup>此段論述明顯是針對毛澤東。可以說，贛州慘敗，雖然讓毛澤東得以迅速復出，但在戰略構想上，他與中央局的衝突仍然難以調和；進而，在整個權力體系中，他也仍舊不能佔據主導地位。

江口會議後(1932年3月)，按中央局的既定政策，應該是紅一、紅五軍團組成中路軍(後改為東路軍)，紅三軍團、紅十六軍組成西路軍，兩路軍隊「夾贛江而下」，向北發展。但毛澤東仍未放棄自己的主張。在軍隊出發前，他成功說服紅一軍團領導人林彪、聶榮臻等人，並鼓動他們向中央局施加壓力。林、聶3月21日向中革軍委報告稱：「行動問題，我們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見」。<sup>81</sup>中央局的決議被臨時更改，引起很大震動。3月27日、28日，連續兩天，周恩來在瑞金主持中央局會議，重新討論軍事戰略問題。經過激烈爭論，進軍閩西的主張被勉強通過。

毛澤東的「突然襲擊」，迫使中央局更改了既定方針，看似贏得了一個回合。但實際上，這也進一步加劇了人事紛爭。中央局成員對毛澤東的排擠與防範之心更趨嚴重。謀略分歧與權力爭奪不可避免的混雜在一起。當毛澤東率軍向龍岩、漳州進軍時，留在後方的蘇區中央局密切配合上海中央的指示，對毛澤東發起了嚴厲批判。先是4月14日，臨時中央來信，強調進攻「戰略」，要求對「右傾作最堅決無情的爭鬥」。<sup>82</sup>5月3日，毛澤東接到轉發來的中央函電，毫無顧忌的回復稱：「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完全是錯誤的」。<sup>83</sup>也許毛澤東誤以為蘇區中央局會站在他這邊，所以才會有如此大膽的言辭。但問題是，蘇區中央局其他成員並未熱烈回應。就在同一天，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朱德聯名給上海中央去信，表示接受上海中央的批評，並一致譴責毛澤東的政治路線「乃是百分之百的右

<sup>80</sup> 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頁78。

<sup>81</sup>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頁323。

<sup>82</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70。

<sup>83</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72。

傾機會主義」，聲稱中央局所有其他委員都反對這條路線。報告最後稱：「我們決定同毛澤東的錯誤進行鬥爭，並在黨的機關報上進行批評」。<sup>84</sup>蘇區中央局其他成員與毛澤東完全撇清關係，全體成員站在他的對立面，毛澤東徹底成為孤家寡人。5月11日，蘇區中央局又在汀州開會討論中央指示，並正式作出決議。在決議中，中央局一方面痛斥毛澤東「主張向著偏僻區域發展」的戰略，批評他的主張「簡直是蘇維埃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路線」；另一面，又堅決表示會「徹底糾正」這種錯誤。<sup>85</sup>此一時期，毛澤東在前線帶兵打仗，相繼攻克龍岩、漳州等城市，極大補充了紅軍物資，可謂戰功卓著。但後方中央局卻在毛澤東不知情的情況下對其發動一連串批判，這讓毛澤東異常憤怒。6月初，毛澤東從漳州回師贛南，才看到中央局5月11日的決議。事過9年後，即1941年，他談及此事，仍舊心緒難平，稱：「六月回到長汀，見了這個皇皇大文，茅塞為之頓啟。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辦法，一審終結，不許上訴的」。<sup>86</sup>其憤懣的心情，由此可見一斑。

1932年6月初，毛澤東率東路軍回師贛南。大約在同一時期，為應對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中央局對紅軍編制做了調整——主要是取消東路軍、西路軍番號，恢復紅一方面軍建制。但建制恢復後，毛澤東並未官復原職(毛澤東原來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中央局原本計畫由朱德任總司令，王稼祥任總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任總政委，毛澤東僅以蘇維埃政府主席的身份隨軍行動。但周恩來認為，若由他兼任總政委，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無事可做」。周恩來稱「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儘量使他發展而督促他改正錯誤」。這句話通常被拿來當做周恩來擁護毛澤東的例證。其實此語有兩層意思：一方面周恩來的確是充分認識到了毛澤東的軍事才能；但另一方面，這段話也表明他們二人在戰略上存在分歧。周恩來明言：「他(按：指毛澤東)做總政委其許可權於指揮作戰戰術方面為多」。<sup>87</sup>不難看

<sup>84</sup> 〈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和朱德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2年5月3日)，收入中共江西省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3卷，頁2165。

<sup>85</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74。

<sup>86</sup>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頁334。

<sup>87</sup> 〈南雄水口戰役的初步總結及組織問題〉(1932年7月29日)，收入中共江西省黨史

出，周恩來讓毛澤東留在前線，主要是讓其在「戰術」上發揮作用。至於在戰略問題上，則是要督促毛「改正錯誤」。這或可視作「用小棄大」。周恩來的設想固然不錯，但毛澤東絕非只滿足於「戰術」指揮，戰爭一旦開打，他必然要在戰略層面上「指手畫腳」。後來寧都會議上的衝突，恰恰就是源於戰略層面上的分歧。

在周恩來力薦之下，毛澤東被任命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但這個總政委與稍前的總政委(暨毛澤東首次擔任的總政委)完全不可同日而語。1930年8月，首次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時，毛澤東是軍中最高領導人，基本上可以「自行其是」。但在新的權力架構中，前線最高軍事會議是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組成。周恩來為主席，「負責解決一切行動方針與作戰總計劃」。毛澤東的作用僅限於具體的戰術佈置，一旦他有「右傾」苗頭或提出「保守」的戰略主張，周恩來便會以「最高軍事會議主席或中央局代表名義來糾正或解決」。<sup>88</sup>不難發現，在新的權力結構中，周恩來獨佔鰲頭。他擔負著隨時糾正毛澤東「錯誤」的重任。毛澤東雖被任命為總政委，但權力已大大受限。

毛澤東被防範，固然有權力相爭的因素，但最關鍵的原因應該還是謀略分歧。周恩來讓毛澤東留在前線並不是因為贊同他的「保守」策略，而是看重毛澤東帶兵打仗的能力。如果說毛澤東「安於本分」，只在具體的戰術上出謀劃策，不對整體的「進攻」戰略提出異議，那麼，他仍然能夠留在核心權力層。畢竟，革命者之間有共同的「道」，尤其在革命成功之前，尚不至於因權力之爭而你死我活。但問題是，毛澤東在前線仍舊習性不改，「機會主義路線仍在繼續」，並「常常試圖加以實施」。<sup>89</sup>在此種局面下，周恩來及其他中央局成員必然會出面「糾正」他的錯誤。如此一來，人事紛

---

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4卷，頁2307。

<sup>88</sup> 〈南雄水口戰役的初步總結及組織問題〉(1932年7月29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4卷，頁2307。

<sup>89</sup> 〈中共蘇區中央局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2年9月30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4卷，頁2409。

爭便不可避免。

1932年8月8日，中革軍委正式委任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同日，中革軍委下達關於發起樂安、宜黃戰役的訓令。23日，戰鬥結束，紅軍勝利攻克樂安、宜黃。按中央局的既定部署，紅軍下一步應當進攻中心城市——或西取吉安，或北攻撫州。但毛澤東再一次試圖改變中央局的戰略部署。他計畫先分兵赤化河西兩岸，等待敵情變化，實際上就是拒絕進攻中心城市。這引起多數中央局成員的不滿。當時中央局共有8人，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在前線；任弼時、顧作霖、項英、鄧發在後方。現存研究認為，此次爭論是因為「蘇區中央局在前方和在後方的成員之間發生了嚴重分歧」。<sup>90</sup>表面上看，這個論斷似乎有幾分道理。畢竟，主張「暫緩出擊」、「等待敵情變化」的信函，是由在前方的周、毛、朱、王聯名發出；而要求「進攻」的信函，是由在後方的任、顧、項、鄧聯名發出。前後方的觀點涇渭分明，而且各有4人署名，似乎有兩派相爭的跡象。但問題是，若前方周、毛、朱、王都主張按兵不動，那麼毛澤東何以會在寧都會議上成為孤家寡人？若當真是前後方成員的看法不一致，那麼寧都會議上的爭論至少應當是勢均力敵，不至於僅打倒毛澤東一人。

事實上，前方的「保守」主張，主要來自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等人未必同意。查前方4人聯名發出的信函共有3通。分別在1932年9月23日、9月25日、9月26日發出。這幾封信都是在申述不進攻的理由，周恩來也都有簽名。但周恩來真的是與毛澤東站在一起，主張「保守」戰略嗎？其實不然。最關鍵的證據是，除共同聯名給後方中央局發信外，周恩來在9月24日曾單獨給後方中央局發了一封信。此封信明白提及他與毛澤東的爭論。<sup>91</sup>

在這封信中，周恩來首先表達了對於前方意見不能統一的不滿。周恩來稱，「前方關於戰略原則與發展方針，時常引起爭論」、「有時今天以為是的，明天立以為非，工作在不定狀況之下非常難做」。關於爭論的原因，在

<sup>90</sup>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頁336。

<sup>91</sup> 〈周恩來致中央局信〉（1932年9月24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4卷，頁2395。下段所引用內容，如無特別說明，均出自此封信函。

周恩來看來是因為前方組織「不是集權於個人負責制」，負責人有不同的意見，「以致許多行動並非在一致的路線下執行的」、「且行動定了、做了，又人各一見，各異其解釋」。這番話充分表明，前方4人，即周、毛、朱、王的意見並不一致。所以，這場爭論並不是源於前方中央局成員與後方中央局成員的分歧，而是前後兩方中央局成員與毛澤東個人的分歧。

在信中，周恩來還隱晦表達了對毛澤東的不滿。他向後方中央局狀告到：「前方每遇商榷之事，動輒離開一定原則談話。有時海闊天空，不知『伊於胡底』，而實際問題反為擱下」、「尤其是軍事戰略，更可以隨意恣談，不值定則，因此工作方針極難穩定」。這裏雖然沒有直接點出毛澤東，但所指已十分明顯。尤其是「隨意恣談」、「不值定則」二句，是極典型的毛氏風格。信尾，周恩來向後方中央局建議：「前方負責人太多，我意與其各持一見，不如抽出人來做前線與後方的群眾工作」。後來的結果，恰如周恩來所建言的那樣——毛澤東離開前線，去後方做群眾工作。周恩來私下與後方中央局聯絡，致使毛澤東被徹底孤立。這應該是寧都會議上毛澤東一敗塗地的關鍵原因。

為解決爭論，9月30日下午，後方中央局成員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攜帶劉伯承從瑞金出發，前往寧都，準備召開中央局全體會議。<sup>92</sup>此處需要說明的是，劉伯承並非中央局成員，之所以帶其去前方列席會議，完全是周恩來的提議。在9月24日的信函中，周恩來明確講到：「我意劉伯承必須調來當參謀長，才可以有一個幫手，才可以時時以應該遵循的原則來警醒我們」。<sup>93</sup>當時前方的參謀長是葉劍英，周恩來顯然認為葉劍英不能勝任。寧都會議一開完，10月上旬，上海臨時中央就發電報命令葉劍英與劉伯承職務對調，葉劍英回後方任紅軍學校校長，劉伯承出任參謀長。<sup>94</sup>表

<sup>92</sup> 〈蘇區中央局決定立即在前方召開中央局全體會議致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電〉（1932年9月29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4卷，頁2405。

<sup>93</sup> 〈周恩來致中央局信〉（1932年9月24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4卷，頁2396。

<sup>94</sup> 軍事科學院編，《劉伯承年譜》（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2），上卷，頁51。

面上看，葉劍英被調開是緣於臨時中央的命令，但實際上是周恩來的作用，臨時中央只是給予追認。之所以調劉伯承到前方，是因為他曾在蘇聯學習過軍事，理論經驗豐富，而且擅長正規軍事戰略，這與毛澤東從經驗中得來的「遊擊戰理論」恰巧是針鋒相對。周恩來期盼他「時時以應該遵循的原則來警醒我們」，這個「原則」顯然是正規戰的原則。後來的事實也表明，在第四、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劉伯承恰是「正規戰」戰略的主要策劃者。寧都會議後，葉劍英與毛澤東一同被調回後方。「途中，兩人交談甚深」，可謂同是天涯淪落人。<sup>95</sup>

1932年10月3日到8日，中央局全體會議暨寧都會議召開。但因為沒有留下會議記錄，所以具體過程不詳。只有10月21日，蘇區中央局給上海臨時中央發的一份簡報上，大體講述了會議經過。主要內容有：一、全面批判毛澤東「保守」觀念，簡報中稱之為「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鬥爭」。11月12日，任弼時等後方中央局成員給上海臨時中央的信中也提到，由於毛澤東公開反對中央的行動方針，「因而我們集中火力反對這種錯誤」。<sup>96</sup>二、決定由周恩來「負戰爭領導總責」，如此一來，周便可以「專一獨斷、迅速決定問題」，避免紛爭。<sup>97</sup>這其實是回應了周恩來在9月24日的信中提出的「許多事件既不能決之於個人」、「有時爭論則不勝其爭論」、「軍事行動須當機立斷」等問題。<sup>98</sup>可以發現，周恩來在9月24日的「私函」中所提出的種種要求，實際上都得到了滿足。

值得注意的是，簡報中提到，周恩來在會議上提出要毛澤東留在前線當「助理」；或由「毛同志負主持戰爭責任」。但中央局多數同志認為「毛同志承認與瞭解錯誤不夠」，不同意讓他「主持戰爭」。「最後是通過了恩來

<sup>95</sup> 劉繼賢主編，《葉劍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頁76。

<sup>96</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年譜》，頁195。

<sup>97</sup> 〈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1932年10月21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4卷，頁2443。

<sup>98</sup> 〈周恩來致中央局信〉（1932年9月24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4卷，頁2395。

同志第一種意見」，即讓毛擔任「助理」一職。<sup>99</sup>留毛澤東在前線當「助理」，自然是讓其在「戰術」上出謀劃策。這與之前讓毛澤東出任總政委的設想如出一轍。至於讓毛澤東「負主持戰爭責任」，這在很大程度上或許只是虛晃一槍。畢竟，就當時情勢而言，毛澤東的保守戰略，絕對不可能被中央局接受。周恩來對此應該相當清楚，況且他自己也不同意保守戰略。因此，周恩來這個註定要被否決的提議，也許只是用來安慰毛澤東，又或許是用來試探中央局其他成員的反應。

毛澤東在寧都會議上被「圍剿」，自然不願意擔任「助理」一職，再次稱病要求回後方休養。這其實正中中央局的下懷，因為在寧都會議召開前，即9月30日，後方中央局給臨時中央去信時就表示：「為了軍事領導人觀點一致，我們堅決而公開地批評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並想把他召回到後方(中央)蘇維埃政府中工作」。<sup>100</sup>不難發現，在會議召開前，前後方中央局成員，實際上已經串通一氣，意欲共同向毛澤東發難。因此，毛澤東在寧都會議上一敗塗地的命運實際上早已註定。

通過分析毛澤東與外來人員從謀略分歧到權力相爭的過程，可以看出，自中央局設立之後，毛澤東雖然失去了對紅軍的控制權，但本來仍然可以有一席之地。只是他過於堅持保守戰略，最後導致被徹底排擠出軍隊。但另一方面，因為「道相通」，所以即便是權力鬥爭，也並不是你死我活。臨時中央一再重複：「請嘗試用同志式的態度爭取他(按：指毛澤東)贊成積極鬥爭的路線」，並且要求「不進行反對毛澤東的公開討論」。<sup>101</sup>共產國際也認為，雖然「毛澤東的總方針是錯誤的」，但鑒於他是有聲望的領袖，並且有出色的軍事才能，所以在糾正其錯誤時，必須「盡可能地採取和善的方

<sup>99</sup> 〈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1932年10月21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4卷，頁2443。

<sup>100</sup> 〈中共蘇區中央局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2年9月30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4卷，頁2409。

<sup>101</sup> 〈中共中央給中共蘇區中央局的電報〉(1932年10月7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4卷，頁2429。

式」。<sup>102</sup>不難看出，從周恩來為首的蘇區中央局，到博古、王明為首的上海臨時中央，再到共產國際，他們從未想過要徹底搞垮毛澤東，而是一再嘗試著將其拉出「右傾」的泥潭。他們對毛澤東共同的看法或可以概括為「大事有錯，小事沒有錯的」。<sup>103</sup>這說明毛澤東在處理具體事務上的能力被一致認可，只要他在戰略問題上點頭認錯，應該很快就能回到核心權力層。但無奈又可敬的是，毛澤東對自己的戰略構想極為堅持。1932年11月23日，上海臨時中央詢問毛澤東對罷官一事「有否反對和抵抗？」蘇區中央回復稱：「並無其他反對與抵抗」，但仍然有來信，申述其「以準備為中心的意見」。<sup>104</sup>當周圍之人都在呼喊「進攻」時，毛澤東能夠抗住壓力，拒絕隨波逐流，此種「頑固不化」的精神既讓人吃驚，也令人讚歎。從這個角度看，毛澤東的的確確可以當之為有「獨立意見」的人。

## 五、結語：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寧都會議之後，毛澤東抵達長汀福音醫院休養。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在周恩來的主持下進行。紅軍第四反「圍剿」拋棄了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採用大兵團作戰的方式，竟獲得勝利。這極大鼓舞了中央的「進攻」精神，但對毛澤東來講卻極為不利。他以往兩次離開軍隊時，紅軍都吃了敗仗，所以才能很快復出。而第四次反「圍剿」戰爭，拋棄了他的戰略之後，卻依然取得勝利。這就把毛澤東推到一個很尷尬的位置，導致他很難「翻案」。1933年6月，即博古、張聞天等臨時中央領導人到蘇區後，毛澤東趁機對寧都會議提出批評，對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對待提出申訴，試圖進行「翻案」。但博古在做結論時，重申寧都會議是正確的，其理由便是：沒有第一次寧都會議，就沒有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sup>105</sup>不難推想，當人們在歡呼第

<sup>102</sup> 〈埃韋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報告〉(1932年10月8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4卷，頁2433。

<sup>103</sup>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頁372。

<sup>104</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年譜》，頁196。

<sup>105</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頁403。

四反「圍剿」勝利時，最失落的恐怕就是毛澤東——因為戰爭勝利，反而讓他變得無足輕重。多年以後，他憤憤然的談到：「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後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裏，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sup>106</sup>為何「過去還靈，後頭就不靈了？」這其中的重要緣由，或許就是離開他之後，紅軍依然能夠取得勝利。

不難想像，若是第五次反「圍剿」紅軍仍然獲得勝利，那麼毛澤東必定會被繼續冷藏。恰恰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為毛澤東的重新復出與崛起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平臺。反過來看，黃道炫的研究證明，蘇區後期的人力、物力已趨近枯竭，反「圍剿」戰爭註定失敗。<sup>107</sup>而毛澤東恰好在潰敗之前抽身而退，這使得他完全避免了戰爭失敗的責任。後來的革命史因此而生出一種解釋，即：反「圍剿」之所失敗，是因為毛澤東失去了領導權。這就很容易給人們造成一種毛澤東可以左右全局的印象。

從短時間段看，寧都會議的確導致毛澤東失去了權力；但從長時間段看，毛澤東的適時「隱退」，恰恰為他後來塑造個人權威提供了絕佳的素材與契機。從這個角度看，豈不可謂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縱覽中共中央控制軍隊的歷程，可以說，組織控制、技術運用、權力重組是可以看得見有形手段；另一方面，信仰作為看不見的手段，在「黨指揮槍」的過程中亦發揮著關鍵性作用。近代以來，國共兩黨都試圖把軍隊從個人手中解放出來，建立「黨軍」。以後見之明觀之，國民黨並不成功。雖然在權力調配與人事佈局上，國民黨中央煞費苦心，但效果不彰，組織無力、信仰不堅應該是關鍵原因。中共中央能夠有力控制軍隊，實際上是權謀與信仰的有效結合。下級黨員對上級的服從與信仰，是中央權威的重要支撐；而正是借助這一權威，中央得以在軍隊核心權力層順利進行人事佈局，進而全面掌控軍隊。至此，「黨指揮槍」方才落到實處。

<sup>106</sup> 〈毛澤東接見一個外國共產黨代表團的談話記錄〉，1956年8月5日。轉引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頁402。

<sup>107</sup> 具體論述可參閱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 徵引書目

## Bibliography

## (一) 史料

-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檔選集》第 1-6 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Zhong yang dang an guan, bian. *Zhong gong zhong yang dang xuan ji*, di 1-6 ce, Beijing: Zhong gong zhong yang dang xiao chu ban she, 1989.
- 中共中央文獻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6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shi, Zhong yang dang an guan, bian, *Jian dang yi lai zhong yao wen xian xuan bian*, di 6 ce,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11.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Mao Zedong nian pu*, shang jua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14.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Ren Bishi nian pu*,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14.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Zhu De nian pu*,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6.
-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朱德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bian ji wei yuan hui, bian. *Zhu De xuan ji*,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83.
-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龍巖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 1-4 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Zhong gong Jiangxi sheng wei dang shi yan jiu shi, Zhong gong Ganzhou shi wei dang shi ban gong shi, Zhong gong Longyan shi wei dang shi yan jiu shi, bian. *Zhong yang ge ming gen ju di li shi zi liao wen ku · dang de xi tong*, di 1-4 jua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11.
- 中國革命博物館編，《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Zhongguo ge ming bo wu guan, bian. *Cai Hesen de shi er pian wen zhang*,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80.

方志敏，《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Fang, Zhimin. *Wo cong shi ge ming dou zheng de lue shu*,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80.

毛澤東，《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Mao, Zedong. *Mao Zedong jun shi wen ji, di 1juan*, Beijing: Jun shi ke xue chu ban she,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1993.

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

Shimotelai. *Wei da de dao lu Zhu De de sheng ping he shi dai*, Beijing: Dong fang chu ban she, 2005.

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Ren, Jianshu, zhu bian, *Chen Duxiu zhe zuo xuan bian*, Shanghai: Shanghai ren min chu ban she, 2010.

江西省檔案館、中央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Jiangxi sheng dang an guan, Zhong yang Jiangxi sheng wei dang xiao dang shi jiao yan shi, bian, *Zhong yang ge ming gen ju di shi liao xuan, bian\_zhong, ce*, Nanchang: Jiangxi ren min chu ban she, 1982.

亞歷山大·潘佐夫著，卿文輝譯，《毛澤東傳》上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Pantsov, Alexander V. zhe, Qing, Wenhui, yi. *Mao Zedong chuan, shang ce*, Beijing: Zhongguo ren min da xue chu ban she, 2015.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Jin, Chongji, zhu bian. *Mao Zedong chuan (1893-1949)*,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4.

軍事科學院編，《劉伯承年譜》，上卷，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2。

Jun shi ke xue yuan, bian. *Liu Bocheng nian pu, shang juan*, Beijing: Jie fang jun chu ban she, 2012.

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Xu, Zehao, bian zhe. *Wang Jiexiang nian pu*,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1.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

Gao, Hua. *Hong tai yang shi zen yang sheng qi de: Yanan zheng feng yun dong de lai long qu mai*,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 wen da xue chu ban she, 2011.

郭化若，《郭化若回憶錄》，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

Guo, Huaruo. *Guo Huaruo hui yi lu*, Beijing: jun shi ke xue chu ban she, 1995.

郭德宏編，《王明年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Guo Dehong, bian. *Wang Ming nian pu*, Beijing: She hui ke xue wen xian chu ban she, 2014.

陳毅、蕭華，《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Chen, Yi, Xiao, Hua. *Hui yi zhong yang su qu*, Nanchang: Jiangxi ren min chu ban she, 1981.

彭德懷，《彭德懷自傳》，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

Peng, Dehuai. *Peng Dehuai zi chuan*, Beijing: Jie fang jun wen yi chu ban she, 2002.

黃克誠，《黃克誠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

Huang, Kecheng. *Huang Kecheng hui yi lu*, Beijing: Jie fang jun chu ban she, 1989.

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 1933-193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Huang, Daoxuan. *Zhang li yu xian jie: zhong yang su qu de ge ming 1933-1934*, Beijing: She hui ke xue wen xian chu ban she, 2011.

劉繼賢主編，《葉劍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Liu, Jixian, zhu bian. *Ye Jianying nian pu*,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7.

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

Xiao, Jinguang. *Xiao Jinguang hui yi lu*, Beijing: Dang dai Zhongguo chu ban she, 2013.

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 1-2 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

Zong zheng zhi bu ban gong ting, bian. *Zhong guo ren min jie fang jun zheng zhi gong zuo li shi zi liao xuan bian*, di 1-2 ce, Beijing: Jie fang jun chu ban she, 2002.

## (二) 論文

江峰，〈試論紅軍的通信建設〉，《軍事歷史研究》，第3期(北京，2003.09)，頁 65-74。

Jiang, Feng. "Shi lun hong jun de tong xin jian she," *Jun shi li shi yan jiu*, di 3 qi (Beijing, 2003.09), 65-74.

羅學涓、陳鋼，〈試析“黨指揮槍”建軍原則的確立過程〉，《井岡山大學學報》，第1期(吉安，2010.01)，頁10-13。

## **The Process of Controlling the Red Army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cusing on Mao Zedong's Rise and Fall**

Ren, Wei

Lecturer, Department of Party History,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fter the split with the Kuominta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began to build its own army. However in this process,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CP provided neither financial support nor human resources; it would be fair to argue that the Red Army established its power almost entirely by itsel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CP did not shift their focus onto the base areas, re-examine the power of its military forces, or try to strengthen their control of the Red Army until the latter had grown into a formidable force around 1930. In the ensuing process of gaining control of the Red Arm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had to deal with power struggle and issues such as organizational system, ideology and etc. However, in comparison to the difficulty in controlling the military force since the Beiyang perio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forces was quite effective.

**Keywords: Mao Zedong, the Red Army, the Soviet Areas, Zhou Enlai,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